



清廉思想的文学表达

——于成龙诗词中清廉思想的研究之二

□ 闫卫星

于成龙的诗词作品,不仅是其个人情感的抒发,更是其清廉思想的文学表达。通过深入分析和赏析,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于成龙的清廉思想及其在诗词中的体现。

1、《江月蹉跎六尺身》赏析

“江月蹉跎六尺身,一朝浩荡为民勤。为民请命为民计,甘枕清贫报圣恩。”

这首诗是于成龙以自己的形象为蓝本,表达了他的自我期许与为民情怀。诗中的“江月”象征着清冷、孤寂,而“蹉跎六尺身”则形容自己虽然身材不高大,但志向远大。“一朝浩荡为民勤”展现了他愿为民众付出一切的决心,而“甘枕清贫报圣恩”则深刻反映了他的清廉自守和对皇恩的感激。这首诗语言朴实,情感真挚,是于成龙清廉思想的生动写照。

2、《于成龙劝农积粟》赏析

“劝农积粟,野果酿酒,不夺民食,以安民心。”这首诗反映了于成龙在罗城知县任上关心民生、注重农业生产的务实举措。他鼓励农民积累粮食,以备不时之需,同时也提倡利用当地资源酿酒,增加农民收入。“不夺民食”表明了他坚决不与民争利的立场,而“以安民心”则凸显了他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。这首诗语言简洁,内涵丰富,体现了于成龙的民本思想和务实精神。

3、《于成龙自勉》赏析

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。”这句话出自于成龙的《自勉》,是他对自己为官从政的自我要求。在他看来,个人应当积极努力,去弘扬道德,而不是被动地等待道德来提升个人。这种思想体现了于成龙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。这句话语言简练,但内涵丰富,是于成龙清廉思想的重要体现。

于成龙的诗词作品,以其朴实无华的语言、真挚感人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内容而著称。他的诗词语言简练,意象生动,形式多样,既有长篇叙事,也有短小精悍的绝句,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。于成龙的诗词,语言朴实而不失文采,情感真挚而不造作,思想深刻而不晦涩,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学成就。

探访于成龙故里有所思

□ 王闻冰

近日,我跟随单位其他党员一起,来到方山县来堡村于成龙故里,开展《铭党“纪”于心,清廉在行动》廉政教育活动。

于成龙(1617—1684),字北溟,号于山。他前半生躬耕田园、青灯苦读;后半生入仕为官,位极人臣,堪称清朝早期著名的廉吏和能臣。45岁步入仕途,历任知县、知州、知府、道员、巡抚、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官职。68岁因积劳成疾,病故于两江总督任上,后归葬于方山县横泉村。

于成龙在23年为官生涯中,三举“卓异”。去世后,谥号“清端”,康熙皇帝为他亲题碑文,并赐“高行粹朴”御书匾额,称其品德“朴真”,做官做事“忠勤”,最大优点“廉洁”。清廷先后有武英阁大学士熊赐展,文渊阁大学士、《康熙字典》总裁官陈廷敬等26位名人为他写传。

于成龙的一生,以“民”为社稷之本,时刻把民生疾苦、地方利弊放在心上;以“廉”为官德之首,仕宦数十年如一日,清心寡欲、淡泊明志;以“严”为治政之刚,严于律己,严于下属。自古清官多酷,他是清官,却宅心仁厚;能官多专,他是能官,却从善如流;德官多懦,他是德官,却不乏铁腕。这样一位宅心仁厚的清官,从善如流的能官,不乏铁腕的德官,自古以来难得一见。

一个秉承“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,誓勿昧天理良心”从政誓言的封建官吏,心系百姓,为民生几度不惜丢掉官

帽,甚至牺牲生命;一个虽掌管着中国最富裕的几个省份,但穿的是粗布袍褂,吃的是青菜稀粥,被江南老百姓亲切地称为“于青菜”;他让贪官污吏心胆战,恨之人骨;他让黎民百姓们感恩戴德,敬仰无比。他的清廉、能干,他的凌厉、仁慈,让无数老百姓念念不忘。

探访于成龙故居,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廉政教育课。于成龙犹如一面镜子,仿佛在教育 and 警示人们,要经常“正衣冠、知兴衰、明得失”。于成龙之所以能在地方衙门腐败盛行的环境里,做到一尘不染,就是因为始终坚持自己的为官之道,“不负朝廷,不亏百姓,对得起天地良心”。

从廉吏于成龙身上,我感悟到,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共产党员,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,坚持“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”的理念。在当今社会,领导干部因手中握有权力,必然会面临形形色色的诱惑和考验。因此,领导干部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,以平淡之心对待各种诱惑,要耐得住寂寞,守得住清贫,抵挡住诱惑。要养成勤政的工作习惯,坚持主动作为,切实做到勤政为民。东汉人杨震“暮夜却金”,不受私谒;汉代安陵人项中仙“饮马投钱”,决不做苟取之事;清代廉吏于成龙,面对苍穹立誓:“此生为官,不为衣食!”这些封建官吏尚能如此清清白白,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。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理应廉洁奉公,勤政为民,时刻关心人民疾苦,始终做到心中有廉。

犯颜极谏 直不隐晦

——孙嘉淦的理学思想与履宦事功之二

□ 牛寨中



康熙帝晚年因储位之争,发生了一幕幕纷繁复杂的“夺嫡”之战。孙嘉淦虽在翰林院作七品编修,也耳闻雍正“弑兄”“屠弟”的一系列事件,对新皇不念手足之情的行为,十分不满,而朝中大臣们都敢怒不敢言,民间亦谣言四起。而孙嘉淦则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,奋笔疾书三言:一曰“亲骨肉”,劝皇上不要兄弟相残,以免天下人耻笑,百姓胆寒;二曰“罢西师”,与葛尔丹停战议和,减少士卒伤亡,调兵转饷;三曰“停捐纳”,停止捐官封爵,减免黎民繁重的税赋,让百姓休养生息。尔后,将奏折交给翰林院掌院学士鄂尔泰,托其呈上。

雍正御览孙嘉淦的折子后,便将其甩给大臣们看,并点着鄂尔泰的名说:“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!”

大臣们个个颤栗,都不敢言。孙嘉淦提的这三条建议,可以说每条都严重违背圣意,甚至可以说是公然挑衅。刚在争夺皇位中获胜的皇上,此时正极力打击其他兄弟,确立自己的皇权;西北形势危急,边患不断,正准备出兵征讨;国库空虚,急需充银,卖官封爵便是捷径。所以,雍正看了孙嘉淦的折子,既怒且惊,便斥责鄂尔泰。站列班中的吏部尚书朱轼,看到孙嘉淦上的折子,也很吃惊,同时赞叹后生可畏,勇气可嘉。孙嘉淦是朱轼的得意门生,研求理学,日益见长,他日必是朝中栋梁之才,生怕皇上一怒之下,将其治罪。便出列开导说:“皇上,此生诚狂,然臣窃服其胆。”

皇帝沉思一会,转怒为喜,笑曰:“朕亦服其胆”。雍正一向疑心很重,稍有触犯,必杀无疑。但孙嘉淦的坦诚与大胆,正好使皇上不猜疑,还保住了性命。孙嘉淦一生以忠清鲠亮著称于官林,每次奏劾,必直告无隐。雍正帝曾指着孙嘉淦对九卿说:“孙嘉淦每事陈奏,可谓直言极谏,汝等当以为法。”

一次,皇上召见几位大臣和时任吏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的孙嘉淦议事。雍正帝忽有所思,问诸臣子“天下有几种人?”众臣各说不一。而孙嘉淦则言:“人之熙熙,皆为利来;人之攘攘,皆为名往。普天之下,只有两种人,一种为名,一种为利。”

皇上问:“既然如此,孙爱卿是为名还是为利?”

孙嘉淦说:“为臣不爱钱”。皇上闻之,哈哈大笑。

雍正十年,孙嘉淦任国子监祭酒时,皇上颁旨,要从国子监教习人员中选拔任用一批外放官员,照例需吏部归班,待九卿挑选后,引见皇上,恭候钦定。按成例,这些教习人员“经明事治,才品卓越者,列为一等,恭候皇上钦定,分发各省以知县试用”。其余年轻有才学者列为二等,分发各省以教谕、训导用。孙嘉淦掌国子监祭酒,知道那里有不少期满的教习人员,可以外放。于是,与九卿挑选其中的六名,待十二月十八日早朝时,就向皇上逐一汇报这些人的情况,提出任免建议。他刚禀告完毕,果亲王便出班陈奏:“皇上,孙嘉淦所言,显然是欺罔,此六个教习,如同圣人一样,没有一点毛病。”

皇上听后,便问孙嘉淦:“依尔所见,此六个教习都可外放?”

孙嘉淦道:“皇上,宋镐、方从仁等六人,作教习人员以来,与臣一起共事,从未发现他们有不端之处,且臣与九卿核察无异,可外放。”

雍正帝说:“尔不如回去再详考,朕闻此方丛仁人品不端,把情况搞清楚再议叙。”

孙嘉淦脱口便道:“臣对他们了如指掌,不需再核察。”

雍正帝听了很不高兴:“你敢保举他们吗?”

孙嘉淦跪在殿堂,只顾低头说话,并不知皇上神色不悦,听到问话,仍耿直地说:“臣愿保”。

“宪皇帝不用,公争益坚。”上掷笔与之曰:“汝书保状来!”并随手将御案上的一支羊毫朝堂下一扔,说:“孙嘉淦,给朕写保状来。”

孙嘉淦一听,也很生气。一时气极糊涂,“公持笔欲下”,果亲王见状,呵之曰:“孙嘉淦,汝太狂妄,敢擅动御笔耶!”

孙嘉淦一听,“方悟,捧笔叩头。”“上大怒,反缚置狱,拟斩。”皇帝对孙嘉淦狂妄的言行,颇为愤怒,命刑部将其关押,并要拟定罪行。刑部自然不敢怠慢,几天后便将此案以孙嘉淦“大不敬罪,按律应斩”,禀奏皇上。此时,皇上怒气渐消,已而大学士朱轼曰:“孙嘉淦大戆,然不爱钱,可银库行走。”皇上亦言:“从宽免其治罪,著在户部银库效力行走。”

“公出狱,不抵家。适趋库所”,径自去银库效力,一干就是两年。

银库属户部管辖,时果亲王允礼任内务府总管,兼管户部。一次,果亲王带着几个侍从,“突至库视公。”到了银库,出乎果亲王意料的是,“公方持衡伛偻称量,与吏卒杂坐,劳苦均共。”待亲王检查过所收银两和账册,两相对照,账物相符,丝毫不差。“王大奇之,即为转奏,堪以重任”。雍正知孙嘉淦不爱钱,便启用他为最肥富的山西河东盐政。

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,皇上突然在圆明园驾崩,孙嘉淦特召返京,迁吏部侍郎,乾隆元年,又补授都察院左都御史。他深感身负朝廷风纪重任,要不辱使命,直言谏诤,为整肃吏治勤勉效力。其时,新皇初政,朝野上下,争先恐后,额手相庆,其中不乏阿谀奉承之人,孙嘉淦忧心新皇被此风所染。匡正君心,端正君行,事关国家兴衰之事,是左都御史的头等大事。于是,在乾隆即位几个月后,他便上了一道奏折《三习一弊疏》。

疏折共分十个自然段,近两千字。其中心思想,就是要皇上警惕和戒除三种习气,以杜一弊。三习即耳习、目习、心习,一弊为喜小人厌君子。疏言中指出:皇帝习惯颂扬之词后,就会“喜谀而恶直”;见惯了顺从趋媚之人,就会“喜柔而恶刚”;习惯了自以为是的思考方式后,就会“喜从而恶逆”。“三习既成,乃生一弊”。这就是“喜小人而厌君子也”。他劝谏乾隆帝,要力除“三习一弊”,做到君心居正;要虚怀若谷,不要唯我独尊;要有自知之明,并非无所不通;选拔人才,要德才兼备,“远小人,近君子”。

《三习一弊疏》,不仅使孙嘉淦成为直言谏诤的名臣,其言也被后世诸皇帝当作座右铭,以此警示自己。清曾国藩在其《鸣原堂论》云:“嘉庆元年,道光元年,臣僚皆抄此疏进呈。至道光三十年,文宗帝登极,寿阳相国祁雋藻亦抄此疏进呈。余在京时,闻诸士友多称此疏为本朝奏议第一。余以其文气,不甚高古,稍忽易之。近所细加纳绎,其所云三习一弊,凡明智以上,大抵皆蹈此弊,而不自觉。吾昆弟各录一通于座右,亦小宛诗人迈往之道也。”

